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发展与高水平构建

周文,刘少阳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继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又一次对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全面部署,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与《意见》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从引入市场机制开始进行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到正确处理计划 and 市场的关系,再到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探索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经济体制“定位”到制度化“定型”的过程,经济体制改革最根本的逻辑就是生产关系结构的调整要适应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两者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意见》是坚定不移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市场机制;高质量发展;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3.9;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0)04-0001-09

## On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ZHOU Wen, LIU Shaoyang

(Institute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Opin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accelera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n the new er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Opinions") is yet another overall deployment of the issues of market economy system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4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6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收稿日期:2020-06-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9MZ019);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7DZJ011)。

作者简介:周文(1966-),重庆市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system and the "Opinion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is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It is an exploration and adaptation to the fundamental realities of China being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 process transforming from the "positioning" of economic system to the institutionalized "finalization", which involves aspects of initiating planned economy system reform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market mechanism, correct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and market, and correct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 most essential logic behind economic system reform is that the adjustment of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should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level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two of which belong to a process of dynamic balance. The "Opinions" is a guiding document for unswervingly building a high-level market economy system,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accelera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in the new era and realiz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new er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planned economy; market mechanism;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conomic system reform

改革开放前,中国主要实行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商品生产和市场调节受到限制,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生产积极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统筹兼顾的方法、原则等突破苏联模式的尝试,随后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价值法则是一所大学校”等重新认识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正确思想,周恩来也提出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市场,刘少奇提出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大计划、小自由”等蕴含市场因素的思想。但由于受历史因素的影响,这些有益探索未能持续发展。改革开放后,从突破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对立,到承认计划经济主体框架内可以引入市场调节;从承认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则提升至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从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到强调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深度有机融合。这既坚持了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又化解了前进中的矛盾;既破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又支撑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完善。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探索时期(1978~1991年)

改革开放初期,党打破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资源体制,主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主动选择引入市场机制。从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承认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从计划和市场调节的二分法到计划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不断加强,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实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市场发挥辅助作用,党试图探索建立一个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又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运行体制。然而,要想冲破计划经济的藩篱,既有重新认识经典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又面临没有先例可循的实践难题,中国走上了市场取向的艰辛探索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一历史性决议打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特有的思想束缚,开始引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邓小平在十一

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又强调了市场取向的“经济民主”以及价值法则、供求关系调节经济的重要性。其实,早在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就提出运用价值规律的观点<sup>[1]</sup>。1978年4月,薛暮桥在《利用价值规律来为经济建设事业服务》的讲话中也提出了学会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sup>[2]</sup>。1979年,于祖尧较早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必然是一种市场经济”的观点,主张把市场经济体制与商品制度分开,“只要社会主义实行商品制度,市场经济的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要人为地取缔它,是办不到的”<sup>[3]</sup>。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的价值规律理论研讨会,也推动了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经济理论的先行探索进一步深化了党对计划经济与市场关系的认识。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外宾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陈云也提出市场调节部分是计划调节部分的有益补充,打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的传统思想束缚,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加强。

首先,引入市场机制阶段。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sup>[4]</sup>,试图探索一条公有制主体框架下部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新模式。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及发展模式,区分了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及其方向、范围与界限,同时承认个体经济对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地位,并以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但仍未能摆脱“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的认识窠臼,一直到1984年党的政策文件和领导人讲话都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规范性表述。此时,理论界的研究与党中央政策主张基本保持一致,主要探讨计划经济的弊端、计划与市场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引入市场调节的必要性,大部分学者没能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束缚,只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修补和完善。但也有学者提出在计划调节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市场调节也要有必要的行政支持<sup>[5]</sup>;有学者突破了将市场调节视为权宜之计的错误认识,把市场调节作为经

济改革的长期取向<sup>[6-7]</sup>;特别是1984年在浙江召开的“莫干山会议”,中国的中青年经济学者首次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会议上讲出了一些“新话”,其中关于价格改革的理论主张受到了高层重视。

其次,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阶段。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sup>[8]</sup>不再区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主辅关系,明确承认了社会主义是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具有统一性,计划经济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邓小平也称赞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sup>[9]</sup>。但是,这一时期仍没有摆脱“有计划”的限制,这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计划和商品的双层关系形成了经济双规运行状态,导致流通秩序混乱,“官倒”和“私倒”现象危害严重,社会上动摇了对商品经济和市场作用的认识,邓小平站出来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sup>[9]</sup>

随着对计划和商品认识的进一步深化,1987年2月邓小平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现在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sup>[9]</sup>,同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当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sup>[10]</sup>,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新的经济运行模式。这次会议完全去掉“计划”的相关提法,在国家领导下以企业为经济运行主体、市场为基础,间接强调了市场在经济调节中的重要地位。1989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强调两者相结合的程度、结合方式及范围界限的动态调整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比,区别不在于市场与计划的多少,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机制,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应有机结合。与此同时,学界围绕“计划经济为主”还是“市场经济为主”

展开了一次大的争论,针对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及具体的实施路径而展开讨论,如“板块式结合”“渗透式结合”及“胶块式”的有机结合<sup>[11]</sup>。

最后,从政策实践层面来看,通过市场的不断试错,优化了资源配置,建立了调动生产积极性的激励机制。一方面,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实行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的“大包干”体制,恢复农民主体地位,不断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同时允许计划外的产品以市场定价销售。比如198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1983年又发布《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一号文件”,都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做了具体部署。另一方面,1984年底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开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进行了具有明显市场取向的改革。从1979年发布《国务院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开始,国有企业通过放权让利、利改税、完善承包责任制等措施不断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价格改革实践从调整价格开始到放开计划外价格管控、调放结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逐渐形成;随着价格闯关的失败,中国价格改革也由激进逐步转向平稳推进市场化定价的渐进式价格并轨。据统计,截至1992年,指导性计划产品和市场调节产品占比分别上升至42%、40%,指令性计划产品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16%。此外,通过鼓励发展农村集贸市场和城镇个体经济,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在对外开放层面则设立经济特区及试点,扩大对外开放。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阶段(1992~2012年)

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造成通货膨胀以及1989年国内外政治局势使有些人质疑“市场取向”的改革,更有人把发展市场经济提升到瓦解公有制、否定党的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自由化、和平演变的高度进行批判,甚至提出重回计划经济时代。在这关键历史转折点上,邓小平在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sup>[9]</sup>将计划控制和市场经济看作独立于经济制度之外的手段或方法,廓清了长期困扰人们认知上的迷雾,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正如邓小平所说,从理论上搞懂这一问题,是解放思想的关键。

1991年2~4月,《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4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提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的问題,强调计划和市场是与社会制度“剥离下来”的资源配置机制,再次引发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大讨论。政府和学术界的研究、争鸣加深了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计划和市场与制度无关,两者都是发展经济手段<sup>[9]</sup>,进一步澄清了市场经济姓资不姓社的错误认识,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此时,学术界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基本达成共识<sup>[12-15]</sup>。其中,吴敬琏为纠正有些人对市场取向改革认识的“倒退”甚至走向“邪路”的错误方向,从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等方面进行了重新解读<sup>[16]</sup>,并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sup>[17]</sup>。刘国光辨析了计划与市场的相关概念,并就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作了正确的深入解读,有力回击了错误认识的反复<sup>[18]</sup>。可以看出,大争论统一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性质及其关系的认识,邓小平南方谈话具有的巨大政治感召力和话语影响力,为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基础。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指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根本上肃清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兼容以及计划和市场具有制度属性的僵化教条,扩展了对市场经济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认识,特别是把经济制度问题和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区分来,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革新、完善的历史新时期。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基础上全面描绘了实施的基本蓝图,

制定了推进改革的计划表,大大推进了市场化改革进程。一方面,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发展的方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及法律体系,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政府管理方式、要素市场化、财税金融等领域改革;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开放型经济。《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进一步具体化、系统化,初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sup>[19]</sup>。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及总体框架的初步形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进一步兼容发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如何寻找“新的科学定位”也成为这20多年间探索的主题。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范围不断扩大,一直沿用“基础性”的定位,同时分别使用“进一步”“更大程度”“从制度上”“更广范围”等词语,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然而,无论如何渲染市场经济的地位,都只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还存在诸如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主体地位不平等,要素市场发展滞后,政府行政行为干预过多、越位、缺位与错位并存等一系列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以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市场经济实践的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又需要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总结形成新的理论以指导新的实践,实践和理论相互作用。从实践层面来看,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基本建立”,一直到2013年都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完善阶段,市场经济实践的发展完善经历了一个不断摸索的长期探索过程。一是在所有制层面,强调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共同发展”,并将其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基的高度,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断深化对所有制结构特征、地位和相互关系的认识。二是在收入分配层面,提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生产要素分配,同时把按劳分配为原则提升到“制度化”高度并予以宪法形式的确证;从效率优先、先富帮后富,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再到共享发展、共同富裕,“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三是在微观层面,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与“抓大放小”改革,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总的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客观需要,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定位以确保改革的性质及服务于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利用市场竞争激励机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践充分证明其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性。与俄罗斯执行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遵循逐步推进的路径,把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避免了为市场化而市场化的理论误区,具有显著的制度优越性。然而,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也是经济学西化的开始,将西方市场经济当作发展经济的完美模版,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产生了转轨经济学,由“彼岸”——计划经济转向“此岸”——市场经济,最理想的就是“此岸”目标。现在来看,这样的认识也是有局限性的,没有超越传统的市场经济,没有结合中国特色,没有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 三、新时代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3年至今)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sup>[20]</sup>,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具有党的领导

的政治优势,同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资源配置的长处,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深层次动因。

中国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进入新时代,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及作用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sup>[21]</sup>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作用,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sup>[22]</sup>,从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财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开放型经济等方面进一步规划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任务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全新定位与“基础性作用”是前后衔接、继承发展的<sup>[23]</sup>。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有了新的调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sup>[24]</sup>,把“和”变成了“逗号”,更加突出两者的作用及其边界的差异性,呈现出强政府作用和强市场作用的双强模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基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及能力范畴构建了包含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市场经济体制层面上升到市场经济制度层面,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市场经济高水平建构的重要制度保障。从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这两个维度来看,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从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对经济主体进行调节的制度体系,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区域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有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市场供求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等方面发挥“有效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勾勒了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和实施路径,为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sup>[25]</sup>。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除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外,也有多个方面的体制机制的重大理论创新。一是在所有制层面,始终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断深化对所有制结构特征、地位和相互关系的认识;提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在收入分配制度层面,健全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和再分配调节机制;提出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参加分配;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三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层面,高水平、高标准市场体系强调制度建设,重点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其中,在产权保护制度前面加了一个定语“以公平为原则”,不是片面地强调产权保护制度,它的前提就是以公平为原则,同西方以私有化为最终目的产权理论形成鲜明对比。

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政府和市场的深度有机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从根本上是由社会主义所有制所决定并与所有制、分配制度结合的必然结果<sup>[26]</sup>。其内在的制度规定性说明,市场经济内生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与市场也不是形式上浅层次的结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高度统一<sup>[27]</sup>。从制度上构建社会主义和市场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资源配置的双重优势。因此,中国取得经济发展成就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西方所谓的学习和实行了与他们类似的市场经济,中国当前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也不是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没有完全学习西方造成的。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始终无法克服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破坏力越来越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承受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市场机制有效结合基础上,超越了盎格鲁-萨克森学派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二元对立理论。一方面,能够发挥宏观性、长远性和灵活性优势,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激活微观市场主体活力,避免两级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和利益机制使其具有效率、激励和调节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

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革新,更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的扬弃和全面超越,通过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互作用、协同发力,更加注重发挥政府职能,利用市场机制的信息优势和资源配置高效率,不断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高品质的服务,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sup>[28]</sup>。

## 四、构建新时代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构建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新时代背景下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路径选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适应人们追求更高质量的产品、更高品质的服务的客观需要,解决市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当前,中国处于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经济发展仍存在部分低质量、不平衡、不充分,效率和公平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仍存在质量、技术、结构、城乡协调、收入差距等部分短板,尤其面临后疫情时代下全球经济走向剧烈收缩期的考验。为应对国内外各种极其复杂的风险挑战,必须坚定不移全面系统地深化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扩大对外开放,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实现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为促进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意见》提出“三个更高”,意在强调市场经济的高水平和高质量建构。更高起点就是立足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的伟大经济建设成就基础上,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更高需求为出发点,从8个方面高标准部署中国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高层次就是站在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起点上,突破市场体系不健全等现有的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深化所有制、收入分配制度、市场经济制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更高层次的制度保障;更高目标就是坚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中国建设成为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第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确保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生产资料所有制、收入分配方式、经济运行关系都纳入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制度体系,有利于发挥经济制度整体优势,通过优化基本经济制度内部体系结构,能够提升经济制度体系本身的逻辑自洽性,提高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其中,所有制决定分配、交换、消费等“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的基本性质,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安排,决定整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多种所有制结构和多样化的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又决定中国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体现公有制及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性质,又能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激发经济活力。

第四,坚持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关系是高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越来越强调市场与政府的结合。一方面,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把“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sup>[29]</sup>;另一方面,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是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基本要求和基本遵循。一是市场机制有效。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促进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二是微观主体有活力。通过制度设计、体制机制改革确保商品生产和经营者能够充分发挥生产创造积极性,各类生产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产权受到同样保护。三是宏观调控有度。发挥好有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职能,维护经济秩序,促进公平竞争。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营造一流的市场营商环境。理清政府行为边界,减少政府直接配置和直接干预,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为核心的政府职能转变,更大程度的简政放权,不断优化规范政府职能。

第五,坚持《意见》提出的8个方面,从所有制、基础性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民生保障制度、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党的全面领导等领域全面深化市场经济制度化、法治化建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其实,《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两份文件涉及到当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改变过去城乡土地用地权利不平等、土地要素价格政府垄断以及以征地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都交给市场来决定。

第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高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和难点。一方面,优化国有经济在重要领域布局 and 结构调整,以资本化、证券化的方式优化处于完全竞争领域的国有经济;理清国有资本的投资方向和范围,盘活存量国有资本,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经营能力。另一方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其中,产权是基础性制度,完善的产权制度是高水平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应更加重视公有产权、集体产权等各利益主体的财产保护,完善产权界定、配置和交易制度。

第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方向。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和全球性经济危机风险增大,更加助长了越演越烈的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浪潮。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可能形成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新秩序与新范式。为此,抓住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为全球经济治理做出中国贡献。一方面,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水平相对不高,继续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加快推进“一带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要素全球化配置,提

高经济增长效率,扩大经济增长空间,提高国际竞争力及制度性话语权。另一方面,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全面落实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注重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推进国内经贸规则与国际全面接轨,通过自我革命和外部压力倒逼机制促使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 参考文献:

- [1] 顾准. 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J]. 经济研究, 1957(3): 21-53.
- [2] 薛暮桥. 利用价值规律来为经济建设服务[C]//薛暮桥. 薛暮桥文集(第7卷).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79-90.
- [3] 于祖尧.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1979(50): 35-56.
-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294-352.
- [5] 薛暮桥. 中国经济的调整与改革[J]. 世界经济, 1981(5): 20-22.
- [6] 刘国光. 略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个问题[J]. 经济研究, 1980, 15(10): 3-11.
- [7] 马洪.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J]. 经济研究, 1984, 19(12): 3-15.
- [8]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558-587.
- [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0] 赵紫阳.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4-61.
- [11] 卫兴华.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0(1): 1-11.
- [12] 卫兴华. 关于姓“资”姓“社”与生产力标准问题[J].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 1992(2): 18-22.
- [13] 于光远. 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J]. 经济学家, 1992(3): 9-11.
- [14] 马洪.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J]. 经济研究

- 1992,27(11):3-10.
- [15] 张朝尊,文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中国社会科学,1992(4):3-15.
- [16] 吴敬琏.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思考[J].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2(6):3-12.
- [17] 吴敬琏.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J].财贸经济,1992(7):3-6.
- [18] 刘国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J].经济研究,1992,27(10):8-18.
- [19]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0]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2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44.
- [2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2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1).
- [25] 刘承礼.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与市场的双重视角[J].经济学家,2015(5):28-34.
- [26] 顾海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如何上升为基本制度的[J].红旗文稿,2020(2):4-11.
- [27] 白永秀.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创新及其重大意义[J].社会科学辑刊,2020(4):20-27.
- [28] 周文,陈跃.市场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解释李约瑟之谜的新视角[J].社会科学战线,2014(2):54-64.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